

泸州医学院更名的“倒逼”意义

□ 眉间尺

近日,泸州医学院频繁改名闹得沸沸扬扬。去年4月28日,教育部发函同意泸州医学院更名“四川医科大学”,引起四川大学反对。四川大学认为,并入四川大学的原华西医科大学曾使用“四川医学院”的名称,泸州医学院更名为“四川医科大学”后,容易与百年老“川医”品牌混淆。不料,不到一年,泸州医学院或者说四川医科大学又要更名为“西南医科大学”,而且又一次得到了教育部的认可。一时间,舆论大哗,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官方发布声明,要求四川省“泸州医学院”立即停止其不当更名行为。西南医院院长还撰写了一篇文采不俗、言辞犀利的“战斗檄文”,直斥泸州“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邻家金字招牌也”。

泸州医学院反复更名,反复招来骂声,似乎印证了“no zuo no da”这句网络名言,着实可叹。但细观网上批判之声,又大

多从揭露泸医之“险恶动机”“狼子野心”入手,而以道德谴责或训诫收尾,对于泸州医学院究竟为何不能使用“西南医科大学”之名,并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论据。这样的言论,古人往往称之为“诛心之论”,是党同伐异的利器,却非说理论辩之良策。

我国高校多矣,在绝大多数高校的名称中,地名与专业是两大要素。以此而言,泸州医学院地处西南,主攻医学,欲改为“西南医科大学”,就好比有些房地产商非把两座楼间的一小块白地叫做“广场”一样,娃娃穿大靴,虽有些滑稽,但清者自清,却造成不了什么实质危害。如果它突发奇想改名为“东北医科大学”或“西南服装学院”,才名不符实而难逃欺世盗名之嫌。相反,论者若以其办学规模、水平乃至声望等理由而不让泸医称“西南”,反而有些越老越不让阿Q姓起的蛮横了。

当然,我们知道,更名绝不仅是改几个字,实质是争名分。名分之所以重要,也不仅仅是因为名分,而是因为这意味着在利益格局和声望格局中的位置,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源配置和归属。我国古籍里有一个“百人逐兔”的故事:“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也,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名分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合理的规则及其有效执行。当规则缺失、缺位或不合理、无公信时,“西南”“四川”这样的头衔,就成了名分未定的“兔子”,被人虎视眈眈,必欲逐而后快。

因此,泸医更名包括此前同样引起众多关注的大学简称之争的背后,是高校命名应遵循何种规则的问题。我以为,至少有两条基本原则。

首先,不得僭用已有。高大上的名字大

家都喜欢,但这不能成为抢别人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戴的理由。我在微信圈里读到一篇文章《“西南医科大学”确曾存在——要改名字,要少穿,先学历史!》,作者用功颇深,钩沉史料,指出“西南医科大学”1950年初便已诞生,这一校名使用时间很短,早已消失在历史烟云之中,但它出版的医学教科书和医学专著仍留存于世。文章不长,却很有价值。因为它没有“你不配姓赵”的盛气凌人,而是拿出家谱来指给人看,姓赵的真不是你。

其次,不应随意贴近。上世纪80年代,金庸的武侠小说风靡大陆,于是,书摊上常出现“金庸”“金庸”或“金庸著”的大作,也颇能骗到一些人。我们当然没有权力限制一个人叫“金庸”,而如果这位“金庸”是做大众的,无论做什么馅的饼,卖多少钱一张,也与金庸没有一丝毛钱的关系。但如果不好“金庸”先生也作起武侠小说来,还写了一部

《射鹰英雄传》,男女主角又分别叫做“郭晴”和“王蓉”,那明眼人都能看出不地道了。

再往深了说,改革这么多年来,社会发生剧烈变化,许多老规则不适用了,新规则又没有制定出来。规则空白衍生了资源“白地”,于是,大家竞相跑马圈地,也就难免尘土飞扬。不过,这并不可怕。回顾人类文明史,这样的现象其实经常发生,而且往往只有在圈地的奔马互相碰撞时,才能“倒逼”出一些行之有效的规则来。社会也正是在“倒逼—适应”的往复循环中点滴进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泸医更名引发的争论,恰对这个管部门构成了一次“倒逼”。这不,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将完善学校名称使用的相关政策规定,防止引发高校校名冲突。因此,我们不妨把目光从西南转向首都,跟踪关注一下教育部制定规则的进度和成效吧。

南邮事件敲响警钟

□ 陈莹

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研三学生的坠亡,让又一起研究生生的悲剧进入公众视野。知乎平台上多名自称死者同门的网友曝光其导师学术不作为、克扣学生交通补贴、要求学生上自习课、要求学生将自己列为公开发表学术成果的第一作者、强行收取论文版面费等“七宗罪”,将矛盾焦点指向了该生的前任导师。

从知乎平台的爆料看,死者与前导师之间的龃龉,多与学术资源和利益分配有关。因此我们很难将这桩悲剧当作又一次偶然事件,而仅仅归因于某一位导师的道德失范。多年来,种种以导师为中心的学术资源与利益交换,使研究生与导师之间单纯的教学关系,逐渐异化为“雇佣”关系。这种师生关系的异化,才是此次悲剧的导火线。

当“老师”成为“老板”,学生做科研成了“给老板打工”,有些学生还“依附于”导师,必须对其唯命是从。更有师德有亏者,像南邮学生曝光的那位导师一样,将学生的研究成果据为己有。许多有类似经历的网友在吐槽时都不约而同地用到了一个“忍”字。面对“无德”导师的“压榨”,“不敢说”成了多数学生的无奈选择。

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导师在研究生招考、培养、毕业各阶段享有绝对话语权,研究生学业生涯的顺利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师。最直接的,学生只有获得导师的认可,才能顺利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完成研究生教育。同时,导师在圈内拥有的学术资源和人脉,也有可能成为学生日后事业发展的助力。而另一方面,学校对导师指导缺乏监督和约束机制,导师对学生的影响力也是全方位的。种种利益纠葛,使研究生教育中师生关系变得如此微妙。

学历文凭、科研课题、项目和发表学术论文的量化指标等,是衡量高校教师职称评定和研究生各项荣誉评选,以及未来入职选拔最重要的参考依据。这就造成了研究生教育中,过分重视课题、项目,而轻视基础教学的学术功利化局面。南邮事件无疑给现行研究生教育和监督机制敲响了警钟,然而,年轻的生命就此陨落,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学历文凭、科研课题、项目和发表学术论文的量化指标等,是衡量高校教师职称评定和研究生各项荣誉评选,以及未来入职选拔最重要的参考依据。这就造成了研究生教育中,过分重视课题、项目,而轻视基础教学的学术功利化局面。南邮事件无疑给现行研究生教育和监督机制敲响了警钟,然而,年轻的生命就此陨落,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 前瞻后望

人工智能真的会“思考”吗?

□ 尹传红

人类与机器“对决”,意味着什么?

英国《自然》杂志1月28日封面文章称,美国谷歌公司旗下的人工智能软件“阿尔法围棋”(Alpha Go)打败了欧洲围棋冠军樊麾。这是人工智能第一次战胜职业围棋手,国内有媒体以“人类最后的智力骄傲即将崩塌”为题渲染此事,科技日记者翟剑采写的报道则用了这样的标题:“电脑围棋‘大师’挑战人类尊严最敏感地带”。文末引用一位专家的话说:在终极意义上,人工智能战胜人类是“伪命题”,因为只要规则明确,计算机围棋战胜人类“是迟早的事情”。

而19年前,当IBM公司的超级计算机“深蓝”(Deep Blue)战胜俄罗斯国际象棋大师帕斯卡洛夫时,科技日记者刘亚东发美国的一篇评论标题是:“为人类智慧喝彩”。文中表明了如下观点:人类是“深蓝”智慧的源泉。倘若只有棋王取胜才能带给我们如释重负的轻松感,那便是源自一种对复杂事物的肤浅理解。

的确,棋盘虽小,内里乾坤却大。回想当年,帕斯卡洛夫在与Deep Blue一较高下之前,曾不无豪迈地宣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场比赛等于是对全人类的押

卫。计算机在社会里发挥着如此巨大的作用,它们无处不在。但有一条界限它们肯定无法跨越。它们肯定不进入人类创造力的领域。”据说,后来的失败让卡氏产生了一种深入骨髓的存在危机感,尽管他不服气。此战也被看作是人工智能的转折点。然而,这个话题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争议,有的甚至触及了人工智能的“根子”问题。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美国认知科学家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侯世达)所言:“一旦某些心理机能可以编程,人们很快就不再认为它是‘真正思考’的重要元素了。”这位人工智能研究的前驱者很早就预想过:一个程序只要具有某些基本的启发式规则,再加上计算机在对局时进行盲目的超前搜索时的速度和精度,通过对每种可能的步骤进行分析,就能轻而易举地击败第一流的人类棋手。现在,人们把计算机在对弈时快如闪电但丝毫不涉及直觉的演奏,叫做人工智能的“蛮力”下棋法,并提出质疑:它真的“思考”了吗?

美国数学家、信息论创始人克劳德·香农也认真探讨过这一议题。他说,按照普遍的看法,下好国际象棋需要“思考”。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有两条:一是强迫我们承认机

械化思考的可能性;二是对“思考”的概念进一步做限制。试想,如果一切我们曾经视为“思考”标志的东西,原来都不包含“思考”,那么,什么才是“思考”呢?

整整60年前,1956年的夏天,在美国达特茅斯举行的一次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讨论会上,约翰·麦卡锡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缩写为AI)”这一术语。当时,他与马尔温·明斯基、爱德华·费根鲍姆等10位年轻的学者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且极富挑战性的研究计划:不仅希望通过程序使计算机能“进行棋类游戏并完成其他任务”,而且还可使“人类智能的各种特点和学习的各个方面能够在机器中得以实现。”他们相信机器会思考的时代即将到来,甚至认为实现这一目标根本就用不了20年时间。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他们真是太过乐观了,正可谓“情况不明决心大,胸中无数办法多。”这种“狂妄之勇”亦被视为一种“极端化的理性主义”,因为人工智能的坚定拥护者深信大脑神经元的存储行为和模式改变跟计算机的相应行为非常相似,人脑与思维的关系则如同硬件与软件的关系。一旦计



算机模拟了所有的神经元和它们之间的连接点,就说明大脑的“智力”和计算机的模拟“智力”不再有任何区别。

不过,多年以后他们自己也坦承,当初制定的许多研究目标确实“非常不切实际”。而且,该领域的研究总是在取得一些有限的成果之后便陷入了困境。因此,人工智能研究曾经两度经历“寒冬”,乃至出现“停滞”现象,其项目经费被大量削减,还落下了个好高骛远的“名声”。

在此过程中,质疑的声音一直也没有间断。较为典型的一种批评意见认为,人工智

能研究者所使用的认知和体验模型在根本上就是错误的。那种灵活多样、充满自主性并能稳定地勾勒出人类思维的仿真智能,永远无法通过程序系统来实现;就算是最复杂、最先进的计算机也不能真正地“理解”自身或产生自我意识,因而也无法拥有与人类一样的内在体验……

不管今后是否有可能研制出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一些开创性研究成果和研究理念,已被应用到了许多产品的开发设计上,实际上也不知不觉地融入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之中。

■ 观点速递

鼓励“双创” 请合理发力

政府给失败的投资者以补贴,将风险与投资剥离。投资意味着高风险、高回报,如果投资一家初创公司失败了,却可以享受政府的补贴,这是否公允?是否真正有助于鼓励创新创业?创业不是“哄出来的”,而是逼出来的。创业是成功率极低的一次冒险,是风险极高的个人行为。尤其在目前鱼龙混杂的创投圈内,并不是所有想要创业的人都需要鼓励,也不是所有的失败都应该给予补偿。其实,政府与其花费如此巨大的财力、物力补贴投资失败的投资者,不如在创业者创业过程中给予更多关注和帮扶。

——陈璐(《中国青年报》)评上海财政补贴天使投资损失

“拼车回家” 考验监管智慧

在明确了时代与市场造就了“拼车”现象后,如何监管与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才是管理部门的职责。监管者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交通安全规则,颁行严格的奖惩机制。比如,监督拼车各方实现信息对称,签订拼车协议约定路程、期限、费用及支付方式,双方责任义务等要素,尤其要有约定购买旅游或者交通保险事项。把严控拼车改变成为拼车服务,或许这才是民众乐于看到的。

——金泽刚(《新京报》)评交通运输部支持春运期间互联网平台推出的“拼车回家”

朋友圈“雾霾” 网络创意需少些狂欢

互联网上短命创意、短命产品并不在少数。它们通常在掀起一阵狂欢后,便很快销声匿迹。互联网的生命在于创新。所谓创新,要么是推动产品的升级换代,要么是提供全新的用户体验,最终指向应该是发现用户需求,并且通过持续的投入来保证产品质量和创意的后续发展。短视浮躁的行为,不仅磨灭了已有的创新积淀,消耗网友的关注热情,更容易扼杀网络创意的生存空间,浪费巨大的社会成本。

——张凡(《北京日报》)评微信朋友圈发红包看照片

又是一年“湿地日”,荒漠何时能过节?

□ 王志红

2月2日是第20个世界湿地日。世界湿地日是《湿地公约》的孩子,诞生于1996年。1997年2月2日,50多个国家参与了第一个世界湿地日。人们从关注水禽栖息地开始,逐渐越来越了解湿地生态系统、人类与湿地的关系。

陆地是人类的家园。常见的陆地生态系统有森林、湿地、荒漠、草原、农田等。与湿地的富水相比,荒漠是贫水的;就面积来说,荒漠是广袤的。目前我国湿地面积约53.4万平方千米,荒漠面积是湿地的3倍之多。

提到荒漠,人们常会联想到满目荒芜的景象和刮卷尘起的沙尘暴,似乎“一无是处”,其实不然。荒漠先于人类来到地球,是自然

之子,有着天成的个性与美丽。而荒漠化,是叠加了“人为”之后的结果,也是人类如今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随着对荒漠化研究的深入和防治的尝试,以及对自然现象的分析与解读,科研人员正在拨开尘雾,还原“荒漠”的本来面貌,提升荒漠的“颜值”。

旧念中,沙尘暴是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具有较强的破坏性。然而,同样是沙尘暴,也为人类的繁衍生息做出了贡献。早在人类文明之前,风孜孜不倦地搬运沙尘,在陆地上造就了能满足植物生长的肥沃土壤。例如,黄土高原即是二三百万年以来北半球的西风带搬运中国西北部和中亚内陆的沙漠和戈壁沙尘堆积的产物,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摇

篮。如今,在约占全球陆地面积1/4的荒漠地区,生活着世界上大约1/3的人口。

随风而行的沙尘中,富含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成分。2002年3月20—22日,一场特大沙尘暴席卷北京,给北京的土壤带来了大量天然有效的物理肥料和化学肥料,丰富了土壤中植物生长所需的氮、磷、钾、钙、镁、硼等元素,改良了日益退化的土壤。

沙尘飘洋过海时,部分随大气沉降进入海洋,为海洋生物提供营养物质。地球上50%以上的光合作用是由海洋的浮游植物进行的。浮游植物的增加,除了为其他海洋生物提供更多的食物来源,同时也固定了更多的碳,以减轻全球变暖效应。

■ 书里乾坤

我们为什么需要一部《中国科学技术通史》

□ 江晓原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是一个相当奇特的话题。在学术界,虽然也不乏争论,比如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学之类,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容易达成研究宗旨或取向方面的共识。然而,在互联网的所谓“舆论场”上,情形却完全不同,几乎任何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话题,都会引起两种截然对立的极端情绪:一种是将中国的一切事物和成就都贬低得一无是处,谈论中国的成就甚至能引起他们的愤怒;另一种则将中国的一切都推崇得至高无上,任何试图平心静气讨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方面得失的言论,也会引起义愤。

上面这种现象所提示的提示之一,当然就是公众可能缺乏某些合适的读物。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方面的著作,前前后后也出版过不少,但真正既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同时又适合公众阅读的作品,却极为罕见。就通史类著作而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都是如此。这种著作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学术性的,编纂之初就没有打算提供给广大公众阅读,而是只供学界使用

的。比较重要的,首先当数由李约瑟主持、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从1954年开始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但因写作计划不断扩充,达到七卷共数十册,在李约瑟去世之后该计划虽仍继续,但完工之日遥遥无期。该书在20世纪70年代曾出版过若干中文选译本,至1990年起由科学出版社(最初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出版完备的中文译本,进展更为缓慢。进入21世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主持了一个与上述李约瑟巨著类似的项目,书名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由卢嘉锡总主编,科学出版社出版,虽成于入手,但充克尽功。不过此书三大类共29巨册,对公众来说难免望而生畏。

另一类则试图面向公众读者,其中比较重要的,很长时间只有两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杜石然等六人编著,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此书虽不少量讹误,且行文朴实平淡,但篇幅比较小,提纲挈领,适合广大公众及初学中国科学技术史者阅读。到200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中华科学文明史》,

该书系李约瑟生前委托友人将《中国科学技术史》已出部分简编而成,笔者组织了以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师生为主的队伍完成翻译。但此书受制于李氏原书之远未完结,内容难免有所失衡,故对于一般公众而言,仍非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理想读物。

这次的五卷本《中国科学技术通史》,起因于五年前中央领导同志的垂询与提议,作为一项重大出版工程,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立项,委托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实施,由笔者担任总主编。

笔者受命之后,与诸同仁反复商议,感觉前贤各书已是珠玉在前,这部新的《中国科学技术通史》只有在上述两大类之间,寻求一个折衷兼顾之法,设法让它既有学术价值,也不难通俗易懂,这才予以立项。为此我们在本书中作了一些大胆尝试,力求接近上述理想。

军人物和著名专家撰写,后来甚至出现了“梦之队”“学术头等舱”等夸张的说法。此举目的是确保各章节的学术水准,为此不惜容忍写作风格有所差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两位前任所长,刘钝教授(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前任理事长)和廖育群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前理事长)以垂范,率先为本书撰写他们最擅长的研究内容,全国四十多位作者见贤思齐,认真完成各自的写作任务。再辅之以具有科学技术史专业背景的编辑队伍,比如毕业于东京大学的科学史博士宝铮等。

在结构上,借鉴百科全书的“大条目”方式。全书按照大致的时间顺序分为五卷:I《源远流长》,II《经纬天地》,III《正午时分》,IV《技进于道》,V《旧闻维新》,每卷中再按照大致的时间顺序设置大小不等的专题。

全书不求面面俱到,专题力求博大精深。本书呈现的结构,是在历史的时间轴上,疏密不均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点,而这些点都是术业有专攻的名家之作。

本书在功能和读者对象方面,皆力求将上述两大类同时兼顾。公众如欲了解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某个事件或概念,只需选择阅读本书相应专题即可,并不需要通读全书。而借助全书目录及“名词简释”和“中西对照大事年表”,在书中查找相应内容甚为便捷。同时,由于条目皆出于名家手笔,采纳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各个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本书的学术价值显而易见。即使是专业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者,也可以从本书中了解到许多新的专业成果和思想观念——这些并不是“百度”一下就能获得的。

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初学者,本书门径分明,而且直指堂奥,堪为常置案头之有用工具。即便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业余爱好者,仅仅出于兴趣,对本书常加翻阅,同样趣味盎然,获益良多。

五年辛苦,终于有成,五卷本《中国科学技术通史》正式问世,也算是“盛世修史”的新篇。笔者和同仁们在完成交办任务的同时,内心当然也乐见其成。